



上海市学术著作出版基金

谭旭虎 著

镜像与自我： 史景迁的中国形象建构研究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市学术著作出版基金

谭旭虎 著

镜像与自我： 史景迁的中国形象建构研究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镜像与自我:史景迁的中国形象建构研究/谭旭虎
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ISBN 978-7-208-14572-6

I. ①镜… II. ①谭… III. ①国家-形象-研究-中国 IV. ①D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55061 号

责任编辑 高笑红

镜像与自我:史景迁的中国形象建构研究

谭旭虎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17.75 插页 5 字数 252,000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4572-6/K·2651

定价 58.00 元

镜像与自我：
史景迁的中国形象建构研究



序

对西方世界来说,历史悠久的中国是一个巨大的“他者”,是他们认知自身社会文化的一个绝佳参照系,而海外汉学家,则可说是中国的海外“解说员”。

海外汉学家们,从自身文化体系出发,对中国进行形象认知与建构,并向他们的受众进行传播;对于我们来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西方世界对我们的认知,同样是一个能够帮助我们重新认识、反思自己镜像的参照系。在自身与镜像参照系的比对中,让我们获得了外在于自我的认识视角。正是因为彼此差异性的存在,我们才能够更为明确清晰地确定自身特性,所以说,海外汉学家所建构的中国形象,也正是我们观测“他者”文化视角的重要突破口。本书正是对“他者”文化的一种观测。

谭旭虎女士长期从事美国当代著名汉学家史景迁(Jonathan D.Spence)的研究,并卓有成就。她的博士论文论述的就是史景迁,踏入工作岗位之后,由于专业对口,有时间继续深入探索,尤其是有机会赴美任教,更为她提供了良好的机会,不仅极大地丰富完善了研究资料,且视野也由于切实的异文化体验而更加开阔。在这部著作中,她从文化认知、文化比较及跨文化传播的多元研究视域出发,对史氏所建构的中国形象进行观照与剖析。她不仅清晰准确地勾勒出史景迁所建构的中国形象,详细探讨其建构过程背后的深层文化动因与文化机制,且将这位汉学家放置于更广阔的海外汉学场域中,在与其他同类汉学家的比对分析中,考察史景迁与整体海外汉学的点面关联,得出他在西方语境中解码、建构中国形象的重要

特征；同时，她还以史景迁的中国形象建构为媒介与切入点，分析异质文化相互认知的特点及规律，从而提供了对当下历史语境中文化发展实践的有益建议。

史景迁较之于其他汉学家的最大特点是，他不但获得了学界体制内的认同，且在美国公众领域与主流媒体中也有较高的接受度与影响力，众多美国普通民众正是通过史景迁来了解和认知中国。因此，谭旭虎对史景迁所建构的中国形象进行的专题研究则具备了显而易见的意义——以史景迁为媒介，不仅让我们窥见异质文化相互认知、相互接受过程的特点和规律，同时得以推进我们对西方中国形象建构背后的深层文化动因和机制的了解与洞察。从这个角度来说，谭旭虎对史景迁的研究至少给了我们如下的启发：

首先，她始终未局限于对史景迁的孤立个案解读，而是以史景迁为代表的西方精英知识分子所建构的中国形象为媒介，以点带面地提出对于当代文化发展、文化实践的建设性启示。她的研究让我们发现，以史景迁为典型代表的西方汉学家们在认知中国、建构中国形象的过程中，由于种种历史因素往往被赋予了过多的权力与合法性，因此在当代日益复杂的历史文化语境下，在了解“他者”建构的“镜像”中的自我的同时，如何更好地阐释和表述我们自身，显得尤为重要。

其二，她始终把研究立足点放置于现实历史语境中，力图回答现实文化问题。众所周知，国家之间的综合竞争不仅体现在物质文明的硬实力竞争，更体现在国家文化精神、文化形象的有效输出。这种国家文化形象的输出如果建立在深切了解“他者”视角的基础上，效果则可能事半功倍；相反则很可能事与愿违。

此外，史景迁独特的文史合一的叙事风格，娓娓“讲故事”的叙事策略与文体也引起研究者的注意。由于这一叙事策略，使得史景迁在海外普通受众中有着较其他学者更广泛的影响力与关注度，显然，本研究为如何更好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提供了更具针对性、切实可行的思路和建议。

史景迁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认知呈现出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动态过

程：从早期的保守甚至悲观，到表露出审慎乐观，直至最后对中西之间和谐共处、相互补益的全然信心。通过对史景迁的解读，本书的作者也让我们对中西文化沟通理解抱有更乐观的期待。在当今日益复杂的文化局势下，无论对我们自身还是他人，能做到不固守自封，努力在相互参照、审视的过程中逐渐形成文化互补才是真正具有文化自觉行为的实践方式。

许光华

目 录

序·····	许光华	1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自我”与“他者”·····		1
第二节 研究现状综述·····		5
第三节 目标与方法·····		9
第二章 发现传统：全景明清 ·····		16
第一节 皇权：民族与国家·····		16
第二节 士人：制度与价值·····		28
第三节 乡土：想象与隐喻·····		42
第三章 追寻现代：历史与神话 ·····		57
第一节 知识分子：困境中的抉择·····		57
第二节 太平天国：洪秀全的基督想象·····		69
第三节 现代中国：追寻的神话·····		82
第四章 跨越中西：个体与群像·····		102
第一节 西游记：困惑与疯癫 ·····		103
第二节 改变中国：个体与群像 ·····		113
第三节 想象中国：被建构的形象 ·····		130

第五章 识古鉴今：历时的中国思考	149
第一节 整体概要	150
第二节 文化思考	164
第三节 时政纵横	181
第六章 追根溯源：谱系与特质	198
第一节 宏微相济：史氏中国形象的总体特点	199
第二节 多元传承：史景迁的汉学谱系	202
第三节 文史辉映：史景迁的史学研究特色	212
第四节 细节切入：一种人文情怀	222
第七章 “自我”与“他者”的相互建构：史景迁的意义与启示	235
第一节 感性认知与大众面向：史景迁的学理意义	235
第二节 思想交汇与中国叙事：史景迁的文化启示	241
参考文献	253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自我”与“他者”

无论在哲学还是认知领域,“自我”与“他者”均是一对相互依存、相互映照、相互体察的概念范畴。“他者”作为构建自我意识的重要参照要素,对具体的历史个人是如此,对于不同文化体系之间也一样是确定意义与位置的重要坐标。“自我”与“他者”间的差异性刺激是引起认知反应的主导因素,异质文化彼此互动过程中发生的冲突与碰撞也正是带来进一步深入认知的契机,是促使认知结构发生改变乃至重构的可能动力。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来看,文化的多元发展都是实在的存在而非臆想虚构。文化体系的传承一方面依赖自身主流文化价值的代代传递,另一个重要方面则来自与异质文化的碰撞与开拓。正是在与其他文化的互视互动中,自我文化才得以不断丰富和扩充。正如乐黛云先生所分析的:“用外在于自我的角度,寻找一个‘参照系’,来重新认识自我,是一种有利于文化发展的认识论和方法论。”^[1]在与异质文化体系的比照中,跳出“自我”,才能更加深入地认识“自我”,这正是乐先生所提倡的一种从“他者”反观自身的理论方法与研究手段。也正如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所说:“只有通过他者,我们才能获得有关我们自己的真正知识。”^[2]

中华文化在其绵延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始终未曾中断与异质文化的接触与碰撞,而西方文明可说是近几个世纪来我们最重要的文化对话对象之一。这种对话由于种种历史与现实的原因,常常发生于地位悬殊的前

提之下,各自都曾经抱有巨大的文化优越感,也都曾因为种种误解与成见而彼此壁垒森森。但无论如何,中西彼此之间的相互认知几百年来几乎从未停止,回顾西方文化所建构的中国图景和中国形象,我们发现,“中国”已经成为西方自我认同过程中的一个巨大“他者”,而西方亦是我們思考认识自身,投射自我欲望与想象的重要对象。由于近代以来,中西文化间的对话始终蒙着一层无法回避的帝国主义暴力阴影,国人对于异质文明的回应态度上一直存在着要么全盘拿来,要么固守自封的极端态度,而缺乏更为冷静从容的反省与深思。这样一场持续几世纪的中西文化碰撞与对话,实际为我们提供了巨大的契机与场域,使得对话双方都能够从异质文明所反馈出的自身镜像中得到更为深广的自我认知。从这个层面说,了解自身在异质文化中的“镜像”对于自我文化的现代性重构,认清我们负有的文化使命与责任,更好地作出中华文明的当下应答均具有深远意义。

汉学家作为西方中国形象的主要建构者,往往在学术乃至公众领域充当着中国的西方“解说员”,进行着中国形象的塑造与传播工作。因此,要想考察西方对中国的文化认知,汉学家们所建构的中国图景与形象既是无法忽略的存在,也是一个较佳的切入角度和研究领域;既提供了审视我们自己的契机,更能从一个别样的层面对西方文明进行更为深入的探索和细究。而本研究的考察对象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正是在这样的问题意识引导下进入了我们的研究视野。

相对于历史悠远的欧洲汉学,美国汉学起步较晚,而且有着自己独特的發展轨迹。据朱政惠的分析:“美国汉学的发展进程是欧洲汉学的美国化进程,是欧洲汉学经美国国家利益和价值观调整以后的美国本土化进程。”这一演变最为突出的标志性结果就是,美国汉学将欧洲汉学专注于对中国古老历史文化的研究焦点转到了对近、现代中国问题的探讨。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则是这一历史进程的关键转折点。大战的爆发和国际局势的发展变化使得越来越多的美国学者意识到,专注于古典研究的内容与方式不能适应世界新形势的需要。朱政惠进一步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世界头号强国地位的确立,也使得其以近现代中国社会为主要

研究内容的美国汉学居于世界中国问题研究的中心地位。^[3]也正因为美国汉学与欧洲汉学在研究内容、研究理念、研究范式上的差异,学者又往往将美国汉学称为美国中国学。而史景迁,正是美国中国学阵营中的一员骁将。

美国作为一个学术体系及相关学术机制都相对稳定成熟的国家,由于接受群体有限,学术书籍的出版册数总体相对较少,定价也比较高。通常情况下,一部学术书籍如果能达到2 000册的印量便已可算作较为成功的著作。特别是像研究中国问题的汉学,相对美国学术领域的核心范畴来说实质是一门较为边缘化的学科,情况更是如此。一位西方评论者曾经这样评论汉学家的处境:“汉学家们时日艰难。相比那些更为普通常见学科的学者,汉学家们无法拥有那种能够将精力放在极为细小领域的奢侈……与中国有关的主题几乎都很难划定具体范围,因为西方与中国的文化差异是如此巨大,我们对中国又所知甚少,哪怕解释某一简单的事实都需要花费大量的思考。”^[4]然而,正是在这样一种学术大环境下,史景迁有关中国的著作不但一版再版,更多次登上《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畅销书排行榜,其受众群体范围也大大超出一般学术著作的通常情况。根据美国《图书馆期刊》(*Library Journal*)的统计数据显示,史景迁《追寻现代中国》(*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一书(第一版)的印量一次甚至达到40 000本之多^[5],并且不断再版。其《天安门》(*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一书更是被评为20世纪100本最佳非虚构作品之一。^[6]这种情况在美国学界应该说并不多见,正如乔治亚理工大学历史系卢汉超所言,西方大多数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在其领域外的影响都非常有限,但史景迁却在一般公众领域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卢汉超甚至认为史景迁在学术界外的影响力几乎能够与美国中国学创建人费正清(John K. Fairbank)相提并论。^[7]

史景迁1936年出生于英国伦敦郊外,13岁时进入英国最古老的公学之一温彻斯特学院(Winchester College)寄宿就读,1956年进入剑桥大学克莱尔学院,1959年从剑桥大学毕业后赴美国耶鲁大学深造,期间对中国历史发生兴趣,并师从芮玛丽(Mary Wright)教授攻读中国近现代

史。1965年史景迁获得耶鲁历史学博士学位,其毕业论文《曹寅与康熙:奴才与主子》(*Ts'ao Yin and K'ang-hsi Emperor: Bondservant and Master*)获波特论文奖(John Addison Porter Prize)并破格留校任教。四十多年来,史景迁著作等身,成为海外汉学界中国近现代史的杰出专家。同时,史景迁还是《纽约时报》、《纽约书评》(*New York Review of Books*)、《纽约客》(*New Yorker*)等许多西方知名主流媒体的特约撰稿人,媒体在讨论中国问题时他也是最常被邀请置评的学者之一。2004年,史景迁当选为美国史学界权威组织美国历史协会(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主席,2010年,史景迁更被美国联邦政府授予美国人文文学界最高荣誉“杰斐逊讲席”(Jefferson Lecturer)。有评论者认为史景迁在西方“是我们这个时代拥有最广泛读者群的中国历史学者”^[8],他的大量书籍和文章“提升了西方对于中国历史与文化的理解”^[9]。

事实上,史景迁在中国知识界同样具有相当的影响与关注度。早在1989年,史景迁就曾应乐黛云教授的邀请在北京大学作了题为“文化类同与文化利用:世界总体对话中的中国形象”的系列讲座,此后更多次来中国内地进行交流,同时也经常受邀在港台地区举办各类学术演讲。自2001年底,上海远东出版社开始陆续译介史景迁的系列著作,至今已出版十余种。该套名为“美国史学大师史景迁中国研究系列”的丛书在很长时间都占据着各大学术类图书销量排行的前列,其中《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一书自2005年1月上市后短短几个月就开始重印。^[10]近年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又重新将史景迁的部分著作陆续重译再版,由此可见史景迁在中国的受欢迎程度。

对这样一位既获得了学界认同,同时又能够在一般层面极大开拓汉学视野、赢得受众群体并拥有广泛公众影响力的学者,应该说非常值得引起我们的关注与思考。而我们所关注的焦点则主要集中在对史景迁所建构的中国形象的剖析探讨之上。换句话说,我们关注的主要是史景迁究竟向受众呈现了怎样的中国形象。在审视其所塑造的中国形象之时,另一些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也随之浮现:史景迁是以怎样的方式与机制在建构中国形象?建构的背后存在着怎样的权力关系?文化霸权又是否真

的无孔不入?如果说,西方文明于我们是一面镜子的话,那我们于其中所窥见的自身形象是随着不同历史时期、历史语境不断发生变迁的,镜像中的自我往往会让我们觉得似是而非,有时甚至面目全非。“镜像”在这里成为了一种文化隐喻或者象征,其中混杂着客观与主观、知识与情感、个人与社会、意识与无意识的层层内涵。但有时,正是这种真实掺杂着想象,有效信息混含着扭曲变形的镜像“自我”,让我们窥视到不同文化之间极为生动的交互与联系。也正是在彼此跌跌撞撞的一系列历史误读与虚构想象中,人类历史、文明的丰富性都得到了极大加强。

费孝通先生曾于1983年发表过一篇《我看人看我》的文章,内容是对美国学者阿古什(R.D.Arkush)所写《费孝通传》(*Fei Xiaotong and Sociology in Revolutionary China*)的评论。该文展现出的正是一种变换不居的有趣主客体关系。对阿古什来说,费孝通是其研究客体,但对于阿古什研究结果的评论,费孝通又成为了评论主体。费孝通对阿古什《费孝通传》进行评论正如费先生自己所说,是“看人家怎样看我”^[11]。在这样一种“看”与“被看”的主客体互动中,“自我”与“他者”形成了一种相互观照、相互体认、相互构建的动态认知关系。阿古什对费孝通的研究中存在着不少误差与纰漏,但费孝通认为,重点不在于其事实与观点正确谬误与否,重点在于考察“他者”对“自我”的认知方式与认知情态究竟如何,从而进一步得出有关“自我”及“他者”的多层面多维度认知。

我们对史景迁的研究从某种程度上说,正与费孝通看阿古什的“我看人看我”相类。我们的重点也不在于对史景迁所建构的中国形象作非黑即白的价值判断,而是冀望通过“看”史景迁所呈现的他者镜像中的自我,在“看”与“被看”的互动过程中,获取外在于自身的角度和机会来观照自我,同时考量他人。而新的判断与认知也正是在这样的相互审视与体察过程中不断涌现。

第二节 研究现状综述

对史景迁这样一个无论在学术还是公众领域均拥有较大影响力,极

具代表性的汉学家,针对他的研究也数目繁多。我们将主要从海外与国内两个层面对史景迁研究现状进行梳理分析。

一、海外学界的史景迁研究

(1) 书评式研究。这一类别应该说是海外史景迁研究最主要的类型,所占比例达到90%以上。书评式研究多针对史景迁的某部具体著作,对其内容、叙事方式、阐释机制等方面进行分析探讨。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有费正清发表于《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杂志的《天安门》书评《作家与革命》(*Writers and Revolution*)^[12];又如列文森(Joseph Levenson)发表于《美国历史评论》(*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的《〈曹寅与康熙〉》书评^[13];卜正民(Timothy Brook)发表于《亚洲研究》(*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的《〈利玛窦记忆宫殿〉》书评^[14]等。我们发现,史景迁的每部著作几乎都拥有数目众多的书评,但由于所讨论的对象较为单一,这些书评显得分散而缺乏系统性,较少有针对史景迁整体著作全面而系统的研究。而且,由于史景迁独特的历史叙事方式与一般史学科学化的书写方式差异明显,评论者的视点也多集中在对于史景迁叙事特质、叙事效果的分析,而对其研究所反映出的中国图景与形象缺乏整体性关注与深入探讨。对于占据海外史景迁研究支配性地位的书评,我们需要留心的是,尽管有相当一部分书评仅是简介式的内容概要与评述,但仍有许多书评是由海外中国学界的重要学者撰写(如费正清、卜正民、魏斐德、列文森等),因此海外书评式研究对我们的意义在于:一方面我们获取了海外学界对史景迁中国形象的考察与评价;另一方面,通过史景迁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和把握更广大视域的西方中国图景认知脉络。

(2) 访谈式研究。除了书评之外,另一类海外史景迁研究则主要通过访谈或对谈的形式表现出来。部分访谈是由媒体进行,访谈焦点也多集中在有关中国的现实政治、外交等问题上,往往因为访谈形式与关注角度等因素而不具备太深刻的学术意义。而另一部分由学者进行的访谈则显得学术价值较为突出。这类学者访谈中最具代表性的则是美国佐治亚理工大学历史系卢汉超教授2004年发表于《中国历史评论》(*The Chinese Historical Review*)秋季号的《历史的艺术:与史景迁的谈话》

(*The Art of History: A Conversation with Jonathan Spence*)。〔15〕该访谈内容涉及史景迁怎样处理文学与史学的关系,社会史和日常生活史的研究对史景迁的影响,历史研究与国家政策间的关系,学术研究与通俗历史的互动,中美文化的互相影响等重要问题,对史景迁的治学思路与治学特色都有深入触及,对史景迁研究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3) 总体性评论。除了书评与访谈类研究外,还有一些学者对史景迁进行过整体性述评。其中最具典型性和学术参考价值的是另一著名美国中国学者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在史景迁担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时的一篇总结性评论文章《史景迁的形成》(*The Making of Jonathan Spence*)。〔16〕在该文中,魏斐德从史景迁的学术背景、成长经历、史学成就、教学情况、家学渊源等诸多方面进行了细致深入的介绍与评论。由于魏斐德既是史景迁的学术同行,又是与之私交甚笃的好友,因此这篇总体评论对我们全面了解史景迁来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与价值。

二、国内学界的史景迁研究

从国内研究情况来看,由于史景迁的著作并未得以全部翻译出版,同时史景迁的其他学术产出(如期刊论文等)在国内也并不特别容易全面获取,种种原因使得针对史景迁的研究相对海外来说显得更为零散。大致来说,国内史景迁研究呈现以下几种类型:

(1) 书评式研究。和海外学界情形类似,针对史景迁单部著作的书评同样是国内研究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其中较具代表性的如邢天添发表于《读书》的《王氏之死》书评《太过真实的历史》〔17〕;黄学军发表于《中国图书评论》的《天安门》书评《游魂无处归——读史景迁〈天安门〉》〔18〕;陈意新发表于《历史研究》的《史景迁著〈文字叛逆〉》〔19〕则是对《文字叛逆》中译本的书评。相对海外学界书评性研究,国内的史景迁书评显得更侧重于对书籍内容的概述与评论,而且发表媒介也以大众媒体(如报纸、非学术性杂志等)居多,学术刊物较少。

(2) 普及性的介绍与简评。除了书评之外,国内史景迁研究的另一形式则表现为一些浅显的普及性介绍与评论,如张善鹏发表于《中国青年报》的《汉学大家史景迁的人文视野》〔20〕;海龙发表于《神州学人》的《说

史景迁》^[21]等都属此类。汪荣祖发表于《中国时报》(台湾)的《史景迁论》^[22]在此类研究中相对来说对史景迁的介绍较为深入细致,但由于篇幅限制也未能得以全面地展开讨论。台湾学者陈国栋发表于《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的《史景迁》^[23]一文也是这类普及性评述的典型代表。

(3) 访谈性研究。与海外研究情况类似,国内史景迁访谈也包括一般性媒体访问与学者访谈两部分,前者如《21 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2007 年对史景迁的专访^[24];凤凰卫视《文化大观园》栏目 2007 年对史景迁的访问等。后者如朱政惠发表于《探索与争鸣》的《驰骋国际汉学界的骁将——在耶鲁大学拜访史景迁教授》^[25];马敏发表于《读书》的《耶鲁怪杰史景迁》^[26]等,对我们深入认识史景迁都具有较高的学术参考价值。

(4) 针对史景迁史学理念、治史方式的具体研究。如郑培凯发表于《书城》的《历史就是说故事:耶鲁出身的史景迁》^[27];马金生发表于《史学理论研究》的《试论史景迁的著史风格》^[28]以及朱政惠刊于《史学月刊》的《史景迁史学探要》^[29]比较细致地论及了史景迁的著史特点及中国研究观,分析深入细致,材料翔实,是学术价值较高的研究。

截至本研究为止,国内发行的唯一关于史景迁的专著是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王海龙所著《遭遇史景迁》^[30],该书是作者曾发表的几篇有关史景迁的论文加上史景迁一次讲演内容的中文翻译的合成,并非系统性研究专论。另外,还有几篇硕士论文分别对史景迁的康熙研究、史学思想和具体著作进行了探讨^[31],台湾蒋怡臻的硕士论文《绘写康熙——Emperor of China 及译本〈康熙〉文体评析》则是将史景迁《康熙自画像》一书的英文版本与台湾中译本进行了对比研究,其研究的主要侧重点也在于翻译过程及翻译文体等问题。

经过对海内外史景迁研究现状的粗略梳理,我们发现,史景迁研究现状存在的共同特点集中体现为全面、系统性研究的缺乏,呈现出较为零星而分散的情况,同时,研究对象也均集中在史景迁的著作上,而占据史景迁学术产出很大比重的期刊论文则几乎没有任何触及,不但在研究内容上有所阙失,更缺乏从比较文化角度出发的深入探讨。无论是从广度还是深度上,现有研究与史景迁已经达成的成就与影响均是不相称的,不但